

## 評 Edmund S. K. Fung,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odernity: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Republican Era*\*

陳建守\*\*

Edmund S. K. Fung,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odernity: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Republican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xv+319 pp.

正如「後現代主義」是 1980 年代的流行詞彙，其詞源「現代性」一語約莫於同時寢寢然躍上史壇研究的議程表。眾所周知，所謂「現代性」是指歐洲工業革命後產生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這個體系從 15 世紀開始萌芽，歷經 17、18 世紀茁壯成長，以迄 19、20 世紀發展至顛峰。這個世界體系先從歐洲擴展到新世界的南北美洲，再挾勢殖民主義擴展至非洲、印度洋地區，最後則在 19 世紀延展至東亞和東南亞地區。接受歐洲現代性的後進國，在表現形式上有繼受的一面，亦有摻雜本土思想資源而加以轉換現代性的變異樣貌，這是緣何「單一現代性」轉變為「多元／流動現代性」的原因所在。本文所要引介的書目便是針對中國現代性的思想基礎進行研究的作品。本書除導論不計，共有 7 章。作者馮兆基在導論中提到，本書立基於針對中國現代性的文化與政治

---

\* 本文承蒙一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0 年 10 月 5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0 年 12 月 22 日。

\*\* 臺大歷史所博士生

維度進行研究。作者認為中國現代性的思想基礎是由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三稜鏡式的思想光譜，針對「現代性的危機」所做出的回應。而現代中國的思想體系則是這三者交織而成的概念（頁 2-3）。作者在書中釐清現代中國思想的起源與演變，並且留意現代中國思想、文化中的政治動因與彼時中國身處的世界脈絡（頁 16-17）。在研究取徑上採取「去中心化」的研究方式，跳脫新／舊、中國／西方、傳統／現代、自由／保守、激進／改革二元論的框架，探求新舊之間的斷裂與承續（頁 3-4）。作者不對研究對象進行個人中心的傳記書寫，取而代之的是平行關注個人與團體的關係（頁 18），亦不任意為研究對象冠上任何一種「主義」模式的帽子。理由在於知識分子不論抱持傳統或現代的心眼，都會企求改變中國當時的政治與社會狀態（頁 14-15）。本書所鎖定的知識分子並非左翼人士，雖然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但拒絕接受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的概念，多屬社會和政治改革主義者（頁 3、5）。他們的最大公約數是希望中國可以邁向一個民主、平等兼且保有中國性的現代社會（頁 10）。

作者認為自晚清以來知識分子肆應西力的衝擊，共有四種類型的反應形式：文化激進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新儒家（第二種類型的變體）、激進馬克思主義（頁 4-5）。其中激進馬克思主義不在本書論內，餘下的三種類型便是本書處理知識社群的梗概（頁 5）。在內容上，第一章著重於西化激進主義的推力，如何與文化保守主義呈現拉拒的態勢。激進主義自晚清以來共有儒家激進主義、反滿的激進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與西化激進主義等類型（頁 30）。西化激進主義不是全盤反傳統主義，只針對中國傳統的某些面向（例如禮教、父權體制、家族系統等）進行批判，拒絕承認中國傳統的文化遺產與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將中國與西方的差異無限上綱。這樣的思潮從 1920 年代持續增溫，至 1930 年代陳序經的全盤西化論趨於頂峰（頁 31）。陳序經的現代性方案來自兩個面向：其一是以現代性的視角質疑中國的過去與現在，欲以現代西方文化完全取代中國文化（頁 55）。其二是陳氏的激進主義是國族主義的影響有以致之（頁 31-32）。西化激進主義者認為唯有全盤揚棄過去，才可能擁抱現代性（頁 37）。唯有認同西方，非西方國家才得以進入現代國家之林（頁 24、59），因而陷入文化單一論的泥沼。這樣的思潮爾後逐漸發展成一套以現代化取代西方，成為中國現代性方案的論述（頁 51）。從贊揚

「西方」到稱頌「現代」與「理性」，由「全盤西化」到「現代化」的論述轉折（頁 57）。

接下來兩章的內容，第二章主要針對文化保守主義的拉力進行探索，特別是「東方化」（頁 72-76）和「調和論」（頁 85-88）這兩大思想主題。現代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處於全球化的脈絡中，與西化激進主義共享現代性的關懷，兩者的爭辯就是現代性自身的緊張關係（頁 71-72）。第三章則順勢而下針對 Benjamin Schwartz 所提出的保守主義概念進行反思，特別著重保守主義內中「文化—政治」的鍊結（nexus）。作者認為文化保守主義與文化激進主義處於對話而非對立的關係。民國時期的文化保守主義絕非軟性的力量，亦不可定義成經由文化遺產汲取思想資源的力量，而是一種基於傳統價值的信念，可藉此活化再生為推動現代化的力量（頁 61-62）。作者進一步質疑現代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乃是一戰後反現代化而生的思潮；文化保守主義者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會未加鑑別地保存傳統文化—道德遺產這個斷言。反之，文化保守主義者在批判西化與現代性之餘，並非意味著對啟蒙運動的現代性方案與西化論述全盤揚棄。現代中國的保守主義乃是如汪暉所云的「反現代性的現代性」（a modernity of counter-modernity）（頁 63）。因此，現代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絕非文化基本教義派、或反現代化論者，而是具有批判性的保守主義（頁 93）。除此之外，在國族主義與現代性脈絡下的文化保守主義（或稱政治—文化的保守主義），還可被理解為政治—文化（politico-cultural）的國族主義（頁 98）。這是著眼於文化保守主義以改造文化遺產，作為社會、政治、經濟改革的資源（頁 102-103），是以道德革新為路徑的現代性方案（頁 127）。於此，馮兆基以中國本位的文化再造工程（頁 113）、戰國策派的理念（頁 120）與中日戰爭期間的文化保守主義（頁 117）為例，說明現代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雖是以文化為名，骨子裡卻全然是政治性的訴求。連結文化與政治的關係，現代中國的保守主義無法細緻地歸類為某個範疇（頁 127）。然而，現代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者，除了張君勱、梁漱溟外，大多進行空中樓閣式的烏托邦想像，講究社會道德的重建而非從社會組織、國家建構的方案入手，以致於成效不大未能有效解決中國政治、社會的問題，導致發言的能量逐漸趨疲（頁 93-95）。

第四、五章則是探尋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想及實踐面向。第四章主要針對兩個問題而發：其一，民國知識分子如何理解自由主義。其二，現代中

國自由思想的特徵與關懷為何。作者提出現代中國的自由思想，立基於自由主義是現代性的政治前提（頁128）。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是西方各家自由主義理論和現代中國歷史情境，兩者融攝而成的產物（頁129-130），並針對現代資本主義的回應與批判（頁134、146）。要釐清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構成，即是要站在劉禾所云的「跨語際實踐」和現代中國的歷史脈絡這兩大制高點上（頁141）。所謂的「中國」自由主義即意味著專屬於中國心靈的設想（頁128），這個設想的核心是儒家道德的價值觀（頁130）。因此，現代中國對自由主義的理解立基於兩大前提：其一是自由主義攸關道德價值與憲政體制的權利問題。其二是自由主義能否在國家建構面向產生實質效益（頁145）。由此可知，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並不相悖（頁147），反倒是互為表裡，共同為國家再造的目標邁進（頁149）。第五章則從自由主義的視角觀察國家、政府與法治三大課題，自由主義與現代國家被認為是現代性的兩大標誌（頁159）。在現代中國的自由思想中，健全的國家（strong state）與計劃政府（government with a plan）體現了政治現代性的圖像（頁189），也導引出國家主義是現代中國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徵（頁161）。自由主義視角的政治現代性立基於政府勢必要為一個好政府（頁171），而這個好政府是要擁有立憲體制、開放的計劃政府（頁173、179、182）。在這種前提下，法治體系的建立是極為重要的環節（頁182）。從自由主義的觀點來說，法治是確立個人自由最基本的條件，構成個人與社會間的實質關係（頁182-183）。由制度發展的觀點來看，法治是自由主義追尋政治現代性的重要元素（頁190）。

最後兩章作者將筆鋒轉至社會主義的視野。第六章檢視一戰結束前後所興起的改革社會主義思想。先由梁啟超、張君勱、張東蓀等人的社會主義論述談起，繼而觀察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英國「社會主義」，以及蘇俄的新經濟政策在1920年代對中國的影響。第七章則往下延伸至1930-1945年間中國國家社會主義到社會民主主義的論述轉折。現代中國的國家社會主義是進化至社會民主主義的一個階段（頁225）。這是現代中國尋求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間的第三條路的一項嘗試。作者指出從1920年代開始，社會主義成為現代中國政治思想中的主脈。民國的社會主義有兩大類型：一是訴求革命的激進馬克思主義，另一則是訴諸進化的改革／民主社會主義（頁191）。改革主義是現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的主旋律，目標不在於推翻現有政權，而是希冀改革國家（頁

253)。社會主義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產生影響，始自俄國十月革命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是緣起知識分子驚詫於資本主義帶來的不公與無羈（頁 222）。從五四開始，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交織在自由主義分子身上，改革社會主義闡明了現代中國思想中自由、保守與社會主義的相互關係（頁 191-192）。現代中國的社會主義不關注社會革命、不以階級為基礎，反對共產主義政治所帶來的暴力與壓迫（頁 213、223）。社會主義思想不僅針對社會／經濟不平等開出解藥，內中的關懷更與國家建構方案切乎相關（頁 197-198）。這股思潮在 1930 年代發展出國家社會主義運動，這個運動是基於健全的國家與計劃政府的概念，演化而生的思想（頁 224-225）。現代中國的國家社會主義可由中國國家社會黨的創立作為標誌（頁 224）。國家社會主義是結合進化社會主義、國家主義、國族主義和民主思想的意識型態。國家社會主義體現了自由社會主義的主張：承認資本主義是經濟發展的必要之惡，同時需兼顧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社會與經濟不公（頁 226-228）。第七章處理的另一股思潮是社會民主主義，這是一股希圖經由國家、社會立法的途徑改革資本主義的思想。作者不將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進行明顯的區分，兩者差別僅在於抱持社會民主主義思想者，傾心打造一個結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民主社會主義者則企望建立一個全然社會主義運作的民主社會，內中擁有社會主義式的經濟體系。現代中國的改革社會主義是介乎兩者中間的思想（頁 225）。國家社會主義在二戰後轉向社會民主主義的里程碑是中國國家社會黨內部的分裂，後以中國民主社會黨之名重現（頁 239）。作者最後提到中間路線／第三條路論述其實是個神話／迷思，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者因為缺乏政治實權的緣故，都在專制政府與共產革命中不幸夭折。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挫敗，並非知識分子誤讀自由主義的真諦所致，而是肇因於中國的政治混亂、兵禍連年。自由主義的現代性方案，漠視鄉村群眾的動員力量，亦是失敗主因之一（頁 260）。缺乏合適的政治、社會、民主形式，社會民主主義的訴求誤中改革必敗的魔咒，無法見容於當時的歷史脈絡。後天失調的社會民主主義可謂是超前時代演出的思潮（頁 255）。

結論部分則針對今昔中國的現代性進行反思，作者認為理解中國現代性的辦法是要理解各家各派的思想如何爭辯、互動與影響。反思現代性與追尋現代性同等重要，各種思潮就代表各式版本的現代性方案（頁 256、268）。作



者繼而由歷史連續性的視角切入，提及民國時期的思想論爭依舊影響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關懷。1980年代興起的文化熱、1990年代喊得漫天作響的國學熱，皆反映出保守主義的思想光環（頁265-266）。在鄧小平時代再起的改革社會主義論述，則與194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或稱自由社會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頁236、267）。其中唯有自由主義的論述略為不同，1990年代自由主義的再興，較為趨近西方古典的經濟自由主義，重視個人與政治權利，與其先行者關注國家的特徵有所區別（頁266）。作者最後以上個世紀末的中國（1980-1990）是由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三大思潮交織而成的思想圖景，作為全書的結束語。

本文重點式的介紹工作已如前述。作者提出現代中國的思想不由一家一派所壟斷，而是集合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混合物。現代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乃是應對現代化的力量，是針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起的恐慌、西方啟蒙運動的現代性方案、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激進主義的回應（頁21-22）。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概念，恰好位居天秤的兩端，一端是啟蒙運動的現代性，一邊則是現代性的反論述（頁28）。文化保守主義者並非反啟蒙主義者，他們的反論述（counter-discourse）仍舊是鑲嵌在現代性的概念與實際運作的邏輯中（頁257）。至於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則是西方各色自由主義匯集而成的思潮，其特徵是不贊同黨國體制／一黨專政的政治意識型態。而現代中國服膺各種思潮、信條的知識分子，則普遍具有社會主義的傾向（頁23）。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在發展過程中，都呈現出國家主義的色彩（頁259）。

本書對於現代中國思想的發展與理解，尚有可資分殊與商榷之處，茲爰述如下：首先，馮兆基把「現代性」視為文化符號，劃分三大「主義」的複線結構來布局書中的事件史。在作者筆下，這群為了救國而提出各種現代性方案的騷人墨士，在書中分別以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姿態現身，各自提出其心中擘劃的救國藍圖，每個人則具有兩類思想以上的交織認同。舉例而言，梁啟超在一戰結束後以文化保守主義者現身，他的《歐游心影錄》直指西化派現代性方案的破產。在討論社會主義的章節裡，梁啟超又搖身一變成為批判資本主義禍害的社會主義者（頁194）。張君勱亦身兼文化保守主義與晚清以降的第二代自由主義者，且他的自由主義思想具有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頁137），本書三大「主義」的互動與激盪厥在張君勱一人身上展露無遺。

再者，本書針對文化保守主義的見解對漢語世界的相關研究，有振聾發聵的作用。自從 Benjamin Schwartz 提出現代中國的保守主義起源於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所造成的激進思潮的反動，並非針對 1911 年的辛亥革命而發。這與西方針對法國大革命而起的保守主義有所不同。現代中國的保守主義是一種「文化的保守主義」，而非墨守現狀的「社會政治的保守主義」。<sup>1</sup> 漢語世界的文化保守主義便深受這個研究座標所影響（頁 96 註 2）。復加以文化保守主義的兩大關鍵字：文化與保守。文化一詞包含的範圍無遠弗屆，難以辨別何者不在文化的範疇內。保守一語則使研究者容易陷入相對的二分法中。於是把現代中國思想上的人物（如張蔭麟、梁漱溟、吳宓、柳詒徵、汪康年）或學派（如學衡派、《思想與時代》學人群），都一律劃歸到文化保守主義的陣營。評者認為這樣的區分，太過於將這些個人或團體視為同質性的組合，並且忽略個別知識分子的政治立場。即以學衡派為例，學衡派批評新文化運動與新青年集團，並非因其「新」而是對於其浪漫主義、功利主義與全盤反傳統主義的理念而發（頁 70）。韓子奇對於學衡的研究也指出，吳宓與學衡派同人對白璧德的認識有所不同。吳宓著重白氏的美學品味與世界主義哲學觀，其他同人則強調「貴族式民主政治」的概念。韓子奇闡明學衡派絕非固定的整體，而是一塊不斷擴散的雲團，吸引智識精英所形成的混合體。對於中國現代性的構想是言人人殊、各出機杼的景況。因此，韓子奇認為不能把學衡版的中國現代性方案以保守主義一語概括，而該視為中國參與全球現代性論述的一部分。<sup>2</sup>

第三，本書針對「現代性」為題發覆。作者指出「現代性」難以定義，並非一個固定的概念（a concept），而是多種思想元素的叢集（頁 6-7）。中國的「現代性」是中國與西方歷史經驗下的產物，是針對過去與現在反思下的產物。又說中國的「現代性」是一種論述，強調西方普世主義與中國特殊性的連結（頁 11-13）。從哲學觀點來看，西方的現代性意味著啟蒙運動的大敘事。由歷史視野出發，現代性則意味工業化、資本化的生產模式、民族國家的形

<sup>1</sup> Benjamin I. Schwartz, "Notes on conservatism in General and in China in Particular," in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6-17.

<sup>2</sup> Tze-ki Hon, "From Babbitt to Bai Bide: Interpretations of New Humanism in Xueheng," in Kai-Wing Chow et al., ed., *Beyond the May Fourth Paradigm: In Search of Chinese Modernit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8), pp. 255, 259-261, 263.

成、社會階層的分工與組織（頁8）。但閱畢本書卻很難釐清中國「現代性」的本質或實踐為何。唯一有跡可循者，是本書所研究的三大「主義」都環繞著「國族主義」和「國家建構」這兩大主題開展。因而我們可由此推估中國「現代性」的表現形式是這兩者嗎？又或者說本書是研究中國的現代性，倒不如說是研究時代中的知識分子，如何挪用、面對現代性的危機與挑戰？

第四，本書提及丁文江等人在1930年代「民主與獨裁」論戰底下，所揭示的新式獨裁政體的論述（頁164-171）。<sup>3</sup> 這樣與民主理念相對的獨裁——「反民主」<sup>4</sup> 論述——對作者關懷的當代中國是否有思想上的延續？民國的肇建，並不意味附託於帝制的專制／獨裁主義，就此遠離現代中國的政治文化天地。晚清康有為、嚴復等鼓吹民主的弄潮兒，在民元以後轉向政治保守的立場，甚至參與袁世凱的「洪憲帝制」；再加上另一名言論界驕子梁啟超所提出的「開明專制論」，都可視為是「反民主」論述的先驅。這類論述是否與1930年代出現的「民主與獨裁」論戰有歷史連續性的關連？現代中國的「民主」與「反民主」論述究係處於何種關係。

最後，本書有些許編輯排版上的手民之誤。如頁53註91、304的書名誤植為「政治陳序經哲學研究」，應為「陳序經政治哲學研究」；頁68註26，張君勱之名前多一「新」字；頁73註43，「中國四思想文化」多出「四」字；頁108提及北平的燕京大學，拼音應與後面頁數及索引的拼法「Yanqing」統一，而非「Yanjing」；頁144註52，書名應為「中國近代社會文化思潮研

<sup>3</sup> 關於這場論戰，馮兆基在另一本書中亦有提及，惟其所鋪陳的論述大抵與本書相近。見Edmund S. K. Fung, *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 Civil Opposi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9-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98-113.

<sup>4</sup> 這裡的「反民主」一詞，在現代中國的脈絡下，亦可以「反民主主義」行文。在五四時期，Democracy除了以音譯「德謨克拉西」外，在當時知識分子筆下曾以「庸民主義」、「惟民主義」、「平民主義」、「民治主義」、「民本主義」等譯名出現。根據陳啓修的觀察，在所有譯法中，尤以「民主主義」通行最廣，儘管他本人對這個譯名嗤之以鼻。見陳啓修，〈庶民主義之研究（一）〉，《北京大學月刊》，第1卷第1號（1919年1月），頁25-32。關於Democracy的譯詞演變，可見朱志敏，〈五四運動前後Democracy譯語演變之考察〉，《黨史研究與教學》，1999年第2期（總第146期），頁23-28；朱志敏，〈五四時期的兩種民主觀〉，《教學與研究》，1998年第3期，頁39-45。



究」，而非「中國近代社會文化思想研究」；頁 293，將「任劍濤」誤植為「李劍濤」。

馮兆基跳脫過去關注單一「主義」模式的研究策略，採取一種多元競逐的寫作視角，試圖以動態的過程來重新詮釋現代中國思想史。過去這頁歷史已有許多書寫論客各自構建其雄圖偉業，其間功力的深淺有別，足見這段歷史的底蘊深不可探，期待能波平見底，唯有如作者高明者始可撥雲見日、探驪得珠。

